

# 後現代的民族文物展示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西南少數民族文物展示說明



川西羌族村寨的冬景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前言

「後現代主義」有多重內涵，其部分內涵在於：解構西方對第三世界文化與歷史的論述；反思在近代國族主義影響下第三世界自身的文化與歷史建構；強調社會與歷史的複雜性與多元論辯性；在被忽略的另類歷史中，探索人類社會歷史記憶與書寫的本質；喚起人們對於被主流思潮所遺忘的，或為主流威權所排擠的，社會底層或邊緣人群如婦女和少數民族之注意；著重於展現、分析、詮釋近代學術理性所建立之結構與秩序中被忽略的邊緣異例與斷裂現象。由此觀點，正在籌備的本所文物陳列館中，部分民族文物展示內容與說明，便帶有相當的後現代主義色彩。

博物館中的「民族文物」展示，原來就與十八世紀以來歐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有關。隨著探險者與拓殖帝國之船隊帶回來的文物、照片與傳聞，歐美文明世界的人更堅定其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心——人類在同一漫長的文明進化梯階上攀爬，其目前位置高下與爬昇速度各地人群有異。於是，西方學者在以「歷史」解釋當代文明社會的同時，他們以「民族誌」描述此文明之外的「傳統」異己。<sup>①</sup>描述「異己」之民族誌，無形間成為劃分西方與非西方，當代與傳統，文明與野蠻的工具。「異文化」成為解釋當代文明社會的一個註腳：代表文明人類的「過去」，體現文明社會在人類演進歷史上的地位。如此「傳統的異族文化」成為可供蒐集、展示、欣賞的商品；「傳統的異族文化」之擁有與展示，也展示擁有者在物競天擇下無可推辭的霸權。

在國族主義（nationalism）隨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勢力的擴張，普遍傳播於第三世界之後，近現代各亞、非、中南美洲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s）紛紛成立。國族國家以新的「民族」想像喚起民族感情，結合許多原來文化與認同有異的人群，以對抗西方殖民主義強權。在建國之後，無論是為呈現「傳統文化」以凝聚國族，或呈現「少數民族文化」以強調國族邊緣，傳統文化建構與展示都成為一時熱潮。於是，二十世紀博物館的「民族文物」陳列，不只是西方舊殖民國家的專利，而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普遍現象；其意義不外乎緬懷帝國的昨日光輝，刻劃文明的邊界，創造民族傳統，區分民族（或社會）之核心與邊緣。凡此種種，主要皆透過一些「珍奇文物」的記憶媒介作用（輔以文字），在參觀者心中喚起、組織、建構一些歷史記憶與文化構圖。在如此的展示中，「歷史」是啟蒙理性下一種線性的人類文明進化過程，「文化」是典範化的、精緻的或異類的靜止圖象。這樣的「歷史」與「文化」，造就人們心中刻版的「民族」（我族或異族）意象。此種民族意象常忽略邊緣人群（女性、少數民族或社會下層人民），或更有助於將邊緣人群邊緣化。

① Comaroff & Comaroff,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2),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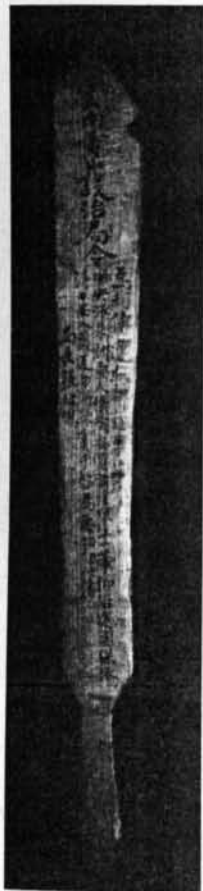
近年來在後現代學風影響下，學術界對於「歷史」、「文化」與「民族」都有些新的看法。因此在一個新的博物館「民族文物」陳列安排中，我們無法只是鼓勵參觀者欣賞異文化之「美」，而無視於此舉是否進一步強化此美學背後的人類社會各種認同、區分與不平等關係。這便是為何在本所文物陳列館改建中，我們對「民族文物」展示作了些新的安排。在這個學術研究性文物陳列中，我們希望透過中國西南民族文物展示，來傳遞一些有關「歷史」、「文化」與「民族」的新訊息。

## 本所早期西南少數民族調查及其意義

本展示區絕大多數的展出文物，都來自於本世紀20-40年代本所前輩研究人員的蒐集。因此首先我們要介紹本所早年的西南民族考察，及其歷史意義。

1928年本所成立之時，主要工作之一便是進行中國少數民族調查，而重點便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西南民族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根據當時學者對「民族」的定義，由語言學、民族學、體質學與歷史學，來探索「中華民族」之構成及其內部區分。從民國18年至民國32年，本所數度派出調查人員從事邊疆民族調查與文物採集。如此十餘年間，調查者之足跡遍及廣西、浙江、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等省邊遠地區。調查記錄的少數族群，以當時之族稱記錄的即達30餘種。當時西南地區各方司令、土豪與股匪橫行，本所研究人員深入邊區所冒之風險與艱辛可想而知。<sup>②</sup>這個學術調查的意義，我們必需在長遠的歷史背景中來了解。

沿青藏高原東緣的高山、峽谷地帶，秦漢時期就有「種類繁多」的非漢人群生活於此。漢代史家司馬遷總稱之為西南夷，並以生計、聚落與髮式將他們分為四類。唐宋時期，曾出現土著邦君建立的南詔（738-902）與大理（937-1252）兩王國。由立國規制看來，這兩個國家都受中國若干影響。然而除此之外，在歷史上本地大多數人群一直統於大小豪強、土官。明清時期，中國授勢力較大的地方豪長以宣慰司、宣撫司等官銜並准予世襲，如此中國得到名義上的宗主權，此即土司制度。明清時期，大量的漢移民進入西南地區。中國也逐步加強對此地區的直接管轄，在清代這便是「改土歸流」政策。然而，事實上有些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仍統於地方土司、頭人之手，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都無力管轄他們。無論如何，長期與漢人的接觸，使得西南各



<sup>②</sup> 展出文物中，有一件木質「令箭」（見本頁照片）。此為雲南貢山設治局發給本所陶雲奎先生的「通行証」；因當時諸土司頭人只認得「大朝」（中國）的令箭。除此令箭之外，陶先生還得由武裝士兵沿途護送。

族群都相當的「漢化」。另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另外兩種文化力量。一是自唐代以來向東擴張的吐蕃或藏傳佛教文化；一是由南方傳來的小乘佛教文化。如此在清代，一些西南族群分別為，或同時成為三大文化圈的邊緣。

清中葉以來，英、法等西方強國已將中南半島與西藏作為其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更進一步企圖經中南半島或西藏將其勢力延伸至中國西南地區。經過多年的探測、傳教與研究活動，西南地區及其土著人群又逐漸籠罩在西方文化邊緣之中。

在列強對中國及其傳統四裔之威脅下，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傳入的國族主義與相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強烈的民族認同與亡國滅種危機感。於是在革命建國之同時，也建立一包含傳統漢人與其四裔人群的中華民族。<sup>③</sup>無論如何，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與軍事角逐下，西南地區沒有成為英國化的西藏邊緣，也沒有成為歐化的南亞邊緣，而成為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邊緣。西南各族群也由傳統的「四裔」成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

傳統中國四裔只是邊緣異類，然而在國族主義下，少數民族也是中國國族的一部分。在「民族」概念下，一個民族是有共同的體質、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的人群，他們在歷史上遷徙、分合。於是，釐清中國境內有多少民族，由歷史來解釋他們間的一體關係，以及主與從、核心與邊緣關係，成為民國與中國國族締造後中國學術界刻不容緩的責任。民國初年梁啟超所揭櫫之中國史藍圖以期於「新史家」者，如「說明中國民族成立發展之跡」，「歷史上曾活動於中國境內者幾何族」等等，<sup>④</sup>在今日看來不過便是民族史。中國人類學先驅黃文山先生，也曾提示「民族學與中國民族研究」之旨趣為，透過實地調查與理論探討，最終目的在達到「中國本位文化之建設」與「民族的國家之建立」。<sup>⑤</sup>在如此國族主義與相關學術背景下，於是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西南民族調查。

本所最早的西南民族考察，應屬1928年黎光明、王元輝的川康民俗調查。他們主要是在川西的汶川與松潘附近調查「西番」、「土民」與「羌民」。較有系統的民族調查從1933年始；是年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等赴湖南乾城、鳳凰、永綏一帶調查湘西苗族<sup>⑥</sup>。1934年，他們又到浙江白門、麗水、青田一帶作畚民調查。1934本所與雲南省政府合作，進行雲南省內的民族調查；這一年凌純聲、陶雲奎、勇士衡等人前往雲南，次年芮逸夫加入此西南民族考察團行列。在1934至1937年之間，他們的足跡遍及大理、下關、保山、騰沖、隴川、潞西、鎮康、耿馬、班洪、西盟、孟連、墨江、開遠、蒙自、昆明等地。其間由於本所調查人員熟悉邊務，曾受邀參加中英滇緬勘界。1939至1940年間，芮逸夫又到貴州大定、花溪、青岩、貴陽、貴定、安順、鎮寧等地

③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 (1997): 1-77。

④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7-10。

⑤ 黃文山，〈民族學與中國民族研究〉，《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1936）：22-23。

進行貴州苗族調查。1941年芮逸夫、凌純聲至川西馬爾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與羌族考察。1942至1943年芮逸夫到川南威信、敘永等地進行川南苗族考察。

在歷時二十餘年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考察中，本所研究人員共蒐集了民族文物1100餘件，各少數民族文書800餘種，田野照片約7000張，並留下許多語言、民俗、體質測量等資料。更重要的是，基於他們的調查所得與其它資料，芮逸夫與凌純聲都曾發表多篇論文以論述中國民族之構成。<sup>⑥</sup>而他們的論述，成為「科學化」中國民族分類的先聲，也影響中共政權下五十、六十年代的少數民族識別。

雖然，當年所謂「科學化」的民族分類與歷史溯源，如今在解構國族主義的後現代學風下，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質疑。<sup>⑦</sup>然而在中國西南民族的例子中，無論是在學術上（什麼是最符合學者心目中民族定義的分類），或人本價值上（什麼是最符合人道與正義的族群分類），任何熟悉西方族群理論與中國西南地區之歷史的學者，恐怕都無法提出一個「正確的」族群分類體系。長久以來本土文化與中、藏、泰文化交融所產生的文化烙印與歷史記憶，造成近代之前西南地區的族群體系。十九世紀以來，中、西學者懷著「民族」概念與各種文化與族群本位主義，進入西南各人群間考察。他們的學術探索與爭辯，以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與更赤裸裸的政治權力交征，最後創造了作為中國邊緣的西南各民族。傳統的中國邊裔「蠻夷」，經「民族化」而成為「少數民族」。

由此觀點看來，本所前輩們的西南民族考察活動，可視為近代中國西南民族「民族化」過程的前導工作。他們每一個人的思想、學術背景，他們的田野調查活動與研究著述，都是我們深入研究隨後的「民族化」過程不可或缺的材料。再者，「民族化」過程在社會主義中國政權成立後更積極的進行。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各個少數民族自我意識抬頭，蒐集、研究（經常實為創造）本民族傳統文化蔚為風氣，於是形成今日多彩多姿的各民族傳統文化。「傳統」所寓含的典範與固持，常讓我們忽略一個社會的變化，以及忽略其內部的多元本質與多層次的權力關係。以此角度來看，本所前輩在20-40年代西南民族地區的考查，透過文物、照片影像與文字描

⑥ 探討芮逸夫之民族史與中國民族構成研究的論文，請參考：謝世忠，〈芮氏民族史的性質及其方法理論建構法則：兼論中國地區族群的歷史過程研究〉，《人類學研究——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台北：南天書局，1990），373-432；王明珂，〈台灣地區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西南民族史研究〉，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发展：回顧與展望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281-317。

⑦ Stevan Harrell,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By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63-91; Norma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92-116.



述，保留了「民族化」之前當地的一些社會文化面貌，讓我們對於「民族化」所造成的當代傳統創造有一「過去」可資比照；這也說明了這批資料在研究上的珍貴價值。<sup>⑧</sup>

## 一個新的西南民族文物展示

如果我們不希望這個博物館展示只是緬懷過去之餘暉、創造民族傳統，或區分文化的核心與邊緣，那麼我們要透過展示以傳達什麼樣的新訊息？由前所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形成，有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與歷史文化建構過程；「近代」只是此過程中的一小部分。一個被展示的「民族傳統文化」亮麗珍貴的外表下，又隱藏著人群內外各次地域群體間、兩性間、世代間、階級間、核心與邊緣間的不對等關係；「民族」或「國族」常是掩蓋它們的表相。因此，我們希望表現的是一個較全面的西南人群社會圖象：由人與環境的關係，到人類的社會分群，到人群的生命信仰；包括過去與現在的歷史過程，以及核心與邊緣的權力關係。

透過本所的民族文物收藏，我們在一平面上展示中國西南民族地區的環境、人群社會與其生命信仰。如此讓參觀者對於西南民族地區及其人群社會，以及一般性的人類社會特質有概括的了解。另外，更重要的是穿插其中的一些展示與說明；我們藉以顯示西南少數民族的「民族化」過程，以及在「民族」認同下社會內部的階級、兩性、世代、區域之區分。如此經緯交織構成整個展示。

「認同」與「區分」是本展示的主題。以文物、文書與照片資料為媒介，輔以九十年代本所研究人員之蒐集品，分為以下三個單元：

- 一、人與地：介紹中國西南邊疆的地理環境、資源與人類生態；說明環境與生態如何造成人群的認同與區分。
- 二、人與人：人群之各種族群、階級、性別之認同與區分；說明此認同與區分如何透過服飾來表達。
- 三、人與天：各族群的生命宇宙觀及相關宗教與信仰；說明人們如何藉宗教與儀式過渡或超越各個生命階段的區分。

以下我們便以此三個單元，介紹本所文物陳列館中民族文物部分。

⑧ 譬如，「包頭帕」目前被認為是羌族婦女的民族傳統服飾，各地有不同的包裹方式，彼此爭奇鬥豔；鄰近的川西漢人沒有此風俗。然而黎光明等人所攝之照片顯示，當時「羌民」包頭帕的方式相當單純，而且據黎等人稱，此包頭帕之習俗與川西漢人並無不同。有關羌族傳統服飾的變化及其意義，見王明珂，〈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 (1998): 841-85。

## 第一單元 人與地：環境區分與人類適應

中國西南地區包括湖南南部與廣西西部的山地丘陵、雲貴高原，以及青藏高原東南緣的高山縱谷地區，地理環境複雜多變是其特色。千百年來，在此多元的環境中，人們以不同的或混合的生計手段，來獲取生活資源。因此，各個族群在生計上有區分、合作，也有競爭。

在此單元中，我們主要透過照片來介紹當地的山川地貌、村寨聚落、生產活動、街市交易活動與城鎮等等。由於照片數量龐大，為了能以有限空間呈現大量訊息，我們將透過兩個影象投射面呈現這些影象，以期能不時更替。如此以影像與錄音解說，說明環境所造成的人類生態、生計與聚落區分。

在文物展示方面，本單元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漁獵工具，一類是生活用品。我們將說明，絕大多數的西南族群都以農業為其主要生計，漁獵只是輔助性經濟行為。然而，本所研究人員所蒐集的生產工具幾乎全為漁獵工具。這個異常現象，或只是因為農具笨重難以運送；或者，由於刻板的邊疆落後民族印象，使得漢族研究者只注意蒐集土著的漁獵工具，而對於習見的農業生產工具缺乏興趣。無論如何，一個不加以適當解說的展示，可能更加深少數民族在主要民族心目中「落後」的刻板印象。

在生活用品方面，本所之收藏多為竹製器具。西南地區氣候宜於竹科植物生長，因取材容易，許多生活用具皆為竹製品。在許多族群中，由家屋到室內之一筷一盤，由初生兒所睡的搖籃，至於為死者送葬之竹牖，皆以竹為之。因此，「竹」在許多西南族群中都有深刻的文化意涵。在這方面，國內學者何翠萍以中國西南景頗族為對象有很深入的研究。<sup>⑨</sup>

## 第二單元 人與人：社會認同與區分

無論以何種手段利用自然資源，人們經常結為一個個的群體，成員們彼此認同並相信有共同的血緣關係，以共同開發、保護、壟斷一個成員共享的生態空間。這樣的認同群體，由近而遠，包括家庭、家族、村寨，或一區域之村寨聯盟，以及更大範圍同一「族群」的人們。如此在一個群體的認同中，不僅本群體與他群體有區分，在本群體內部各次群體間也有區分。在西南民族地區，由於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態的多元化，造成人群認同與區分的極端分化，經常一個只有十幾戶的村寨人群，過去也自稱

⑨ 何翠萍，〈竹與布——景頗文化的一個展示構想〉，發表於「文化展演與人類學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7年6月6-7日）。

是一個「族」。在此單元中，我們以本所收藏的西南少數民族服飾為主軸，顯示各族群間與族群內之區分。

## 服飾與族群區分

人類常以身體特徵，如膚色、頭髮、眼睛等來區分彼此。在體質無明顯差異的人群間，所謂「身體特徵」也包括對身體的刻意改變，如紋身、拔牙、穿鼻與拉大耳垂等等。在人類社會中，更普遍的是以服飾作為身體的延伸；由服飾來表達人與人間、人群與人群間的認同與區



市集中的「野作」(今僂族)

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各區域人群在體質上差異不大，或根本無差別，因此人們常以共同的服飾、髮飾來彼此認同，並藉此區分我群與他群。漢人觀察到這個現象，於是也以土著服飾或來區別西南地區各「苗」、「蠻」族群，並以此將之分類。如本所收藏的《黔苗圖說》中載有狗耳龍家、馬蹬龍家、大頭龍家、剪頭紇佬、鍋圈紇佬，便是以土著的髮式區分為之命名。貴州漢人常稱的紅氍苗、花苗、青苗等，也是以服飾作為土著區分的命名。

本單元展出的西南各族群服飾，分別屬於苗（苗族）、僂（彝族）、撲喇（彝族）、僂黑（拉祜族）、僂僂（僂僂族）、擺夷（傣族）、估宗（藏族）、佻喇（佻族）、阿佻（哈尼族）、戶漢（阿昌族或漢族）等族群。我們用「民族化」前的舊命名，並將目前之民族稱號置於其後的括號之內，是為了彰顯「民族化」前後的差別。本所舊民族調查資料中所稱的僂、毋機、山蘇與撲喇，後來都被識別為彝族。這說明目前的彝族是由許多族群合併而成，因此在服飾上各地彝族有相當差別。不過，這並不代表撲喇、僂黑、估宗等舊稱便是土著自我認同下之族群分類。譬如，漢人又將估宗區分為麼些估宗、臭估宗、小估宗、野估宗等，說明這仍是漢人觀點的族群分類。

至於苗族，明代之《大明一統志》稱苗有13種；清代《黔書》稱苗有29種；《貴州通志》載有苗80多種。民國後之學者，則根據服飾調查認為苗有100餘種。由苗族的例子亦可知，無論是從客觀服飾特徵，或土著的主觀認同，幾乎不可能論斷此一人群內部有多少族群。人們經常在改變或再詮釋他們的服飾，以創造新的認同與區分。優勢族群也經常改變他們對土著服飾的分類概念，以符合其當前對異族的區分。



## 族群內部的區分

人類的族群認同，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民族或國族認同，常掩蓋社會內部的許多問題。在族群或民族認同下，人們親愛自己的「同胞」，卻忽略了同胞之間制度化的、結構性的不對等關係或剝削關係。在本單元中，我們穿插服飾所表現的社會化過程、世代區分、階級區分、性別區分、漢化程度不同者之區分等主題，便是藉服飾表達人類社會的此一面相。

在一個族群中，服飾表達一個人的社會化過程；當一個人成長到青少年階段時，社會便要求他（她）們開始穿著「恰當的」服飾。在西南許多族群中，都有類似的「成年禮」。同時，服飾也表達世代的區分。某一年齡層的人應穿什麼樣的衣服，受到社會的約制。不同年齡層的人因身分角色不同，而有不同的責任與義務，因此服飾也表達一個人在該社會中的身分角色。

在人類社會中，貧富貴賤之別是最普遍的了。這自然也表現在服飾之上；富貴者衣裘服錦，貧賤者但求蔽體。許多西南地區人群，自古以來便是相當階級化的社會。元代以來施行的土司制度，更增長了土著上層對平民的剝削。清代主張「改土歸流」者的理由之一便是：「苗民受土司荼毒，更極可憐；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sup>⑩</sup>這些記載，並非只是中國欲直接管轄西南各族群的藉口。在一般博物館的民族收藏展示中，所展示的經常都是「精品」，如此所展現的「民族服飾」只是該人群之上層階級服飾。在本展示中，我們以幾件較平民化的服飾與土司頭人之服飾作對比，以突顯此一主題。

明清時期，許多西南非漢族群已有相當程度漢化，且受官府管轄。這時中國人常以「生番」、「熟番」來分別土著。生番「深藏山谷，不籍有司」，熟番則「供力役、納田賦與齊民等」。因此服飾也表現土著漢化的程度。「熟番」在服飾與生活習俗上力求模倣漢人，並以此將自己區別於「生番」。「熟番」歧視「生番」，而自稱漢人者（包括被他人視為熟番者）歧視所有的番人。如此一截截的歧視與模倣，便是「漢化」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在西南各族群中，經常上層土司頭人在穿著上比一般平民「漢化」。在本展示中，有許多此類照片都足資証明。服飾漢化的土著頭人們，也常宣稱自身之祖籍為「南京」或「湖廣」，以別於他們的土著子民。這些頭人是否真的是漢人之裔，幾乎是永遠無法解答的謎；這是研究歷史事實與歷史記憶間之關係的好題材。

<sup>⑩</sup> 藍鼎元（1675-1733），《遠省苗蠻事宜論》，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44冊。

在西南許多族群中，男人穿著比女人漢化也是一普遍現象。至少由清代以來，在許多較漢化的西南地區，土著男性在穿著上便與一般漢人農民沒有多大差別。這主要是因為男人常與外界接觸，著漢裝可避免被視為落後的「蠻子」。在成為少數民族後，由於「傳統」一方面可凝聚族群，另一方面卻代表落後。因此女性穿著本民族傳統服飾，而男性穿著現代服飾，成為當前西南民族地區的普遍現象；這是服飾所反映的性別與族群之複合關係。



雲南耿馬地區的擺夷（今傣族）頭人裝扮如漢人仕紳

## 當代西南民族服飾——羌族

以上展示都在本展示區的右半部；由此通過一座「橋」聯結左半部的展示。過了橋後，首先見到的仍是第二單元的展示。這是以羌族為代表的「當代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服飾」展示。這個橋，象徵一個過程——民族化的過程。基於民國以來所得之體質、語言、文化資料與歷史文獻資料，以及社會主義中國建立後進行的大規模民族識別與調查，中國終於將西南各非漢族群歸納為二十五個少數民族。民族識別，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政策與民族知識的推廣，徹底改變了西南地區傳統的族群關係，也改變了傳統的漢與四裔「蠻夷」之關係。因此，過橋後參觀者見到的便是當代中國西南二十五個少數民族圖象。然後，則是當代羌族婦女服飾。

在二、三十年代，川西的「羌民」事實上已相當漢化。當時調查研究者曾記載：「羌人服飾，無論男女，並無特別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飾觀，無從知其為羌人。」<sup>⑪</sup>然而，在「民族化」成為羌族之後，熱心羌族文化的羌族與外族文化工作者，開始找尋、建立與推廣羌民族的「傳統服飾」。在國族主義概念下，男人追求現代化或世界化，婦女則被鼓勵成為傳統的揹負者；在印度國族主義的例子中，學者對此已有論述。<sup>⑫</sup>同樣的，在「民族傳統」的二元對立價值（凝聚認同與守舊落伍）下，現代羌族城鎮知識分子與男性皆不願穿著傳統服飾，然而村寨婦女卻在各方鼓勵下，其服飾愈來愈鮮明而具有少數民族特色。<sup>⑬</sup>同時，許多西南民族原都包括許多地方族群，經

⑪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川西調查記〉（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印行，1943）。

⑫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⑬ 王明珂，〈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 (1998): 841-85。

過民族識別才成爲一個民族。由於各地方族群有強烈的本土認同，在其服飾上原來便有彼此間刻意的區分。在民族化之後，「究竟誰代表本民族文化」更形成一種民族內部的文化展示與競爭，加上觀光與商業動機的驅策，如此也造成少數民族婦女服飾的愈見鮮明。本處展出的是雙泉、曲谷、三龍、黑虎、渭門、永和等地的羌族婦女服飾。參觀者可以見到，地域族群間的競爭所造成服飾上的鮮明化，以及彼此之區分。



雲南傣族少女

## 民族化後的異族形象轉變

「民族化」也改變了邊緣異族在漢人心目中的形象。在相關文獻記載中，「蠻夷」的形象經常是以面孔醜惡、身體強壯的男性爲代表，如此漢人創造、強調他們對「蠻夷」的刻板印象。相反的，近代以來漢民族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轉變爲主要以體態婀娜、身著「民族服飾」的女性爲代表；在這方面，學者已多有論述。<sup>14</sup>在一個以男性爲尊的社會中，人們在族群偏見之下常將異己「女性化」；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在中國，以身著「民族傳統服飾」的少數民族女性形象來強調中華民族的多彩多姿，常見於各種藝術、文學與各種傳播媒體之中。因此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少數民族調查，以及相關的服飾文物蒐集，包括本所的蒐集，便以少數民族「婦女服飾」爲主要記錄、蒐集與研究的對象。這也解釋了爲何本所的西南民族服飾絕大多數爲婦女服飾。

## 文化展示與民族觀光事業

在世界許多地區，少數民族文化都成爲一項觀光資源。觀光事業與少數民族族群意識之關係，也頗受學者關注；國內學者謝世忠對此頗有研究。<sup>15</sup>現代都市人對「土著文化」的欣賞有多重原因：藉以緬懷無法返回的自然生活，滿足置身現代文明中的

<sup>14</sup> Rey Chow,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 1 (February 1994): 92-123.

<sup>15</sup> 謝世忠，〈觀光活動，文化傳統的塑模，與族群意識：烏來泰雅 Daiyan 認同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集刊》48 (1992): 113-129。

自傲，並在少數族群的「異文化」中突顯優勢族群間的文化共性。對於少數民族而言，本民族文化被大眾欣賞、宣傳，也因此增進他們的民族自尊與認同。

目前在中國，在重要國家級會議以及各種大型慶典活動中，都有穿著本民族服飾的各民族男女出席或參加演出。這是一種「文化展示」。此種展示，在各個民族間形成一種文化誇耀競爭。透過各種傳播媒體，一方面強化本民族之認同，一方面強調中華民族內部之多彩多姿。因此在各個少數民族自治區，發展民族觀光事業不只是為增進地方經濟收入，也為了凝聚民族認同。本展示中，也藉著幾件觀光商品化的民族服飾來表達服飾文化的此一面相。

### 第三單元 人與天：生命與信仰

每一個人不只是存在於現實社會中，也存在於「時間」長流之中。在時間中，個人生命有起始、終結；在此有限生命中，人們又常遭遇許多病痛與難以預測的苦難。人類對於生命、歷史的信念，以及對宗教、鬼神的信仰，都因此而產生。隨著個人生命的發展，個人的社會角色也隨之變化。透過各種「生命儀式」如生育、成年、婚姻、喪葬，一個人過渡或超越其各個生命階段的區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不斷得到調整。其次，個人生命有限，因此個人常想像群體社會的生命與歷史，藉以追求個人生命在其中的不朽，如此產生各種歷史意識；如家族歷史、族群歷史，以及宇宙開創與人類起源神話傳說。人們在歷史與神話中，得到對個體生命意義的詮釋，以超脫生死；人們也企圖駕馭或祈求超自然的力量，來解決現實的病痛與苦難，或追求死後的安寧與不朽，如此產生各種的巫術與宗教信仰。

在這一單元中，展示的主軸為本所在大陸時期所蒐集的西南少數民族文書，輔以少部分的文物、照片與錄音材料。以個人生命、群體生命與宗教信仰等三部分來呈現。

#### 個人生命

展示由一些有關「結婚與生育」的苗族、納西族文書開始。結婚不只代表一個新家庭的成立與新個體生命的創造，也代表家族的沿續以及本家族與外界的聯合，影響當地資源分配、分享體系的延續與調整。因此，在此資源競爭劇烈的地區，傳統婚姻談判過程中雙方家族的「根子」（血統）好不好，以及當前的貧富強弱，都是非常重

要的考慮因素。許多展出之少數民族文書，如苗族「謝媒人歌」、「還儺願求子」，都透露此種關懷。

有些西南族群過去相信所有的病痛，以及橫逆不幸的意外，都是由各種魔鬼帶來。因此作法去魔以除病消災，成爲一種特別的學問與職業。此種巫師當地漢人稱之爲「端公」。在有些族群中，巫師也有草藥治病的概念與知識。展示中有不少文書、文物，都與巫師除病、消災、解厄、求雨、敬神、還願等活動有關。由這些文書與文物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漢化」，還有藏傳佛教文化以及小乘佛教文化對土著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

成員之死，在一個社會中打亂既有的社會秩序。經由喪葬儀式，死者被引至死後世界，參與喪葬禮儀者的新舊社會角色得到肯定，社會得到凝聚與延續；儀式後人們返回新秩序所建構的社會生活之中。展出文書中，有一部分屬於此作「陰事」之部分。

## 群體生命

許多西南族群都聚居在由一個或幾個家族構成的村寨之中。「家族」是分享與保護共同資源的親近群體，而個人生命也在家族生命中得到沿續。因此西南各民族中許多祭祖或家神的祭儀，其功能都在凝聚家族團結與誇耀家族勢力。如展示中的納西族的「送祖先經」；在此種經文中，送祖先亡魂或招祖先亡魂都有一定的路線。他們相信經由這個路線至最後亡魂所居之地，便是沿著本族群遷來現居地的路線，轉回祖先起源之地。藉著每一個喪禮反覆強調此「祖源」記憶，因此也強化了本族群的凝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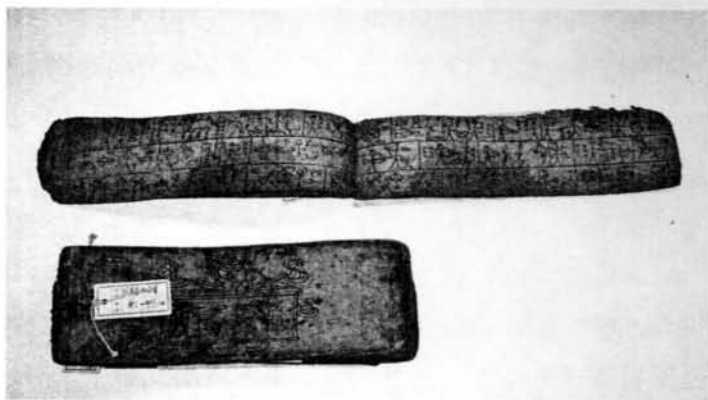
在展示中有湖南苗族文書「楊家吃牛全套」與「吃牛程序概要」。這不是「牛家莊」的祖傳食譜大全。湘西與黔東北的苗族在祭祖儀式中殺牛稱爲「吃牛」。大戶人家祭祖常「吃牛」數十至百頭；這也是一種以誇耀財富來強調家族勢力與地位的習俗。

凝聚一個家族，或更大範圍的族群，經常藉著成員們所相信的「祖先來源」。這是一種「本土歷史」；常以神話、傳說或歷史等各種形式表達。中國魏晉史書上所記載的盤弧、竹王、九隆、廩君等傳說，都是當時漢人採自西南各族群中的祖源傳說。由於和漢人長期往來接觸，許多西南土著人群的祖源記憶混合著漢人的歷史與傳說。如漢化程度較深的湘西苗族中，流傳苗族祖先爲蚩尤之說。漢化程度較低的黔東南苗族，則認爲祖先來自一個從楓木出生的「姜央」。在湖南、貴州及他省的苗人成爲一



個民族後，有些苗族學者認為姜央就是「姜炎」，也就是蚩尤。展件中有一畚族的「人類起源歌詞」，將本族的起源歸於狗頭王盤弧；這顯然也是漢族記憶與土著記憶交互影響的例子。

在西南民族的「本土歷史」中，相當普遍的便是一種「弟兄故事」。<sup>16</sup>譬如，一地有三個寨子，人們常認為三個寨子村民的共同歷史來源是：「從前有三個弟兄到這兒來，在此分家立寨……。」在本展示中，我們以松潘埃溪溝一個村寨的



雲南納西族東巴經

三種「弟兄故事」為例，說明此種「歷史」與一層層的族群認同之關係。最內層是「三弟兄故事」，說明埃溪溝三個寨子的親近關係。在此之外，「七弟兄故事」將埃溪溝人與鄰近松潘、黑水、茂縣等地各溝人群聯繫在一起。最外層，「九弟兄故事」解釋所有羌族的由來。類似的例子，可以讓我們思考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間的關係。

西南各民族中有非常豐富的神話傳說，以解釋天地萬物與人類的起源。這些神話傳說，常表達他們的社會結構、親屬關係與婚配禁忌，人與自然萬物的關係，以及當前人群聚落分布的狀態。其中最普遍的一種人類起源神話，便是「兄妹成婚」故事。故事大多始於一場使人類滅絕的大洪水。一對兄妹躲在牛皮裡或葫蘆瓜裡活了下來。倆人經過一番測試，得到天意應許後，決定成婚造人。婚後生下了一個不成人形的肉團，他們將肉團切碎到處亂甩，於是到處都有了人煙。展品中的苗族儼公與儼母木雕頭像、納西文書中的洪水故事，與羌族口述中的「洪水朝天伏羲子妹製人煙」故事，都是此一傳說的反映。

<sup>16</sup> 在一篇論文中，我將此當作一種「歷史心性」。有此歷史心性的西南各族群，當接觸並接受新的民族分類概念時，他們仍以「弟兄故事」來合理化他們心目中的民族關係。如一則1932年左右採集的有关景頗族（野人）的傳說稱，「我野人與擺夷、漢人同種，野人大哥，擺夷二哥，漢人老三。」（華企雲1932: 332）。彝族（夷族）夷經中記載，夷（Nohsu）、番、漢三族的祖先為三弟兄（庄學本1941: 152-55）。部分苗族中亦有苗、漢、彝為三弟兄的祖先起源故事；傈僳族中也有傈僳、漢、彝為三弟兄的說法（李海鷹等1985: 179-81）。有關弟兄故事及其如何作為一種凝聚人群認同的歷史，請參考：王明珂，〈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283-341。

## 宗教信仰

人類的宗教信仰有許多不同的形式。中國西南各族群長期以來受漢、藏、傣，及近代以來的西方等文化體系的影響，因此在宗教信仰上也非常多元化且豐富。這些宗教信仰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泛靈信仰，如對樹神、石神、雨神等的崇拜，第二種是層級化的人群護衛神，如由內而外的家神、寨神、寨子群共同的山神與廟子等等。第三種是有組織的佛教、道教與基督教。

在中國西南民族中愈受漢化影響的族群，其民俗信仰中道教的成分愈深，表現在喪葬儀式、民俗醫療與祈福還願等方面。許多西南民族的巫師所用的經書內容，以及其施法儀式，都有相當的道教成分。供奉道教神祇的廟子，在西南各民族中也很普遍。甚至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最原始的道教與川西某些古代非漢少數民族有關。在佛教方面，藏傳佛教、漢式大乘佛教與傣文化的小乘佛教，都流行在特定族群之中。過去所稱的西番、估宗、麼些等人群都深受藏傳佛教影響。擺夷、景頗、佤族則不同程度的受小乘佛教影響。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深入西南地區宣道，各族群中也有部分人成為基督徒。在本展示區中，有顯示道教影響的巫師經書，傣文佛經與佛寺畫，以及以漢文作貴州苗族土語拼音寫成的「約翰福音」等文物。

## 結語

以上便是本所即將展出的「民族文物」部分的說明。總的來看，這可說是一個相對而言較少「珍品」的民族文物展示；這也是它重要的後現代特色之一。由以上的說明可以知道，「物」在此只是一些媒介，透過這些媒介我們展出的，或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些珍貴的知識——結合許多當代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研究成果的知識，特別是一些可以讓我們了解近代國族主義下的歷史想像、文化建構與國族認同的知識。我們希望這個研究性博物館的民族文物展示，可以讓參觀者再思考「什麼是民族與文化」、「為何有族群認同」，以及「什麼是歷史」等問題，並吸引一些有興趣的學者，加入相關問題與田野的研究討論之中。最終自然是希望藉知識與記憶的更新，增進人類社會各國家、民族、階級人群間，以及不同性別、世代的人群間，更和諧的相容共處。